

DOI:10.3969/j.issn.1672-1101.2025.05.003

安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史实考辨

孔海棠¹, 吴玉才²

(1. 安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2. 淮南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38)

摘要:长期以来安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是哪一个没有定论。学界将中共安庆支部称为安徽第一个城市党支部,将中共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称为安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安庆支部和中共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在安徽早期共产党组织创建的历史中时间早、影响大。通过研究和考证,发现中共安庆支部的创建时间要早于中共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这并不代表中共安庆支部就是安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通过对 1922 年寿县“二三同志的组织”的史料查证和寿县“二三同志”党员的初步考证,尝试得出 1922 年寿县“二三同志的组织”才是安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结论。

关键词:安徽早期共产党组织;中共安庆支部;中共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考辨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25)05-0016-06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First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 in Anhui Province

KONG Haitang¹, WU Yucai²

(1.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Anhui 232001,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Anhui 232038, 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re has been no definite conclusion on which was the first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 in Anhui. The academic community refers to the Anqing Branc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the first urban Party branch in Anhui Province, and the Shouxian Xiaodianji Special Branc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the first rural Party branch in Anhui. The Anqing Branc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houxian Xiaodianji Special Branc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ve an early history a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early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s in Anhui Province. Through research and verific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Anqing Branc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established earlier than the Shouxian Xiaodianji Special Branc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Anqing Branc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the first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 in Anhui Province. Through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verific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of Comrade Er SAN” in Shouxian County in 1922 and the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the “Comrade Er SAN” Party members in Shouxian County, an attempt is made to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organization of Comrade Er SAN” in Shouxian County in 1922 was the first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 in Anhui Province.

收稿日期:2025-03-11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20 世纪 20 年代上海大学与中共安徽早期组织的创建研究(AHSKQ2022D086)

作者简介:孔海棠(1984-),男,安徽界首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共创建史。

Key words: early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s in Anhui; Anqing Branc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aodianji special Branc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verification and analysis

安徽早期党组织的创建始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正式成立之后。当前学界普遍认为安徽第一个早期党组织有两个,一个是中共安庆支部,另一个是中共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二者都创建于1923年12月或1923年冬,至于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没有定论。20世纪80年代,赵志华认为安徽最早的党组织是创建于1923年冬的中共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①;而根据濮德治^②的回忆,中共安庆支部成立于1923年12月,是安徽最早的党组织^{[1]5}。随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之际,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以下简称“省党史办”)编写《中共安徽党史大事记(1919—1949)》,将中共安庆支部和中共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成立时间都认定为1923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省党史办编写《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史》,将中共小甸集支部表述为“安徽由青年学生在农村建立的第一个支部”^[2]。与此同时,省党史办主办的期刊《党史纵览》在2001年第3期发表了玉耕、巨荣著《安徽最早的农村党组织——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和叶梅荣著《安徽最早的城市党组织——中共安庆支部》两篇文章。自此,安徽党史学界就出现了“两个安徽最早党组织”的观点,即中共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与中共安庆支部都成立于1923年12月或1923年冬,并列第一,分别称为“安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安徽第一个城市党支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时,“两个并列第一”逐渐成为学界共识,一直延续至今。

2021年12月,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成立课题组,再次对安徽早期党组织的创建情况进行深入研究与考证,并取得重要进展,但研究结果仍然没有解决“安徽第一个党组织是哪一个”这个问题^{[3]16-17}。鉴于此,本文基于已有研究,通过进一步挖掘和梳理相关史料,尝试对安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情况进行考证、辨析。

一、安徽第一个城市党支部和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有何文献依据?

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先建党后建团的状况有所不同,安徽经历了先建团后建党的情形。安庆早在1921年春就有建团活动,但由于反动军阀的破坏,直到1922年3月才正式建团。尽管如此,在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召开之前,安庆还是全国较早的18处地方团组织成立地之一^③。王步文、许继慎、杨溥泉、彭干臣等人都在安庆党支部建立前加入了共青团^{[4]8-9}。1922年12月,芜湖团组织得到团中央的正式认可,也成为安徽乃至全国较早建立地方团组织城市之一^{[5]26}。薛卓汉、毕仲翰、王坦甫、曹蕴真等寿县籍青年于1922年在芜湖加入团组织^{[6]120}。安徽团组织的创建和团员人数的不断发展壮大,为在安徽建党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和干部基础。

(一)安徽第一个城市党支部——中共安庆支部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虽是安庆人,但由于种种原因他并没有在安徽建立党组织,直至1923年初他才委派柯庆施赴安庆恢复团的组织和适时建立党组织。在此之前,柯庆施已于1922年夏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步文也于1922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16日,第一届团中央执委会在北京召开第二十六次会议(陈独秀参加),议决委派柯怪君(柯庆施)为芜湖特派员调查芜湖地方团情形,并委派柯怪君为安庆地方团组织人^{[5]29}。1923年春,柯庆施带着陈独秀写给安徽省教育厅长江彤侯的亲笔信来到安庆,以《新建设》日报编辑的身份作掩护,联络和团结安庆、芜湖、蚌埠等地的革命青年,着手整顿安庆地方团组织。1923年6月柯庆施在向团中央汇报这次赴安徽任务完成情况时指出:“我这次自北京到此后,曾以个人的资格,与前次地方团团员

① 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内部资料,1982年版第8页)。

② 濮德治,即濮清泉,是陈独秀的表弟,参与、协助了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的筹建工作。

③ 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5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1957年内部印行,第125页)记载,在全国团的一大召开前全国地方团组织为十七处,后经考证发现缺少1921年5月1日成立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应为十八处。详见王康泰《新发现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档案考》(《党史文汇》2021年第11期)。

接洽,彼等甚消极,而且他们与政治上的关系——保守派——很深,所以使我十二分失望。于是我就从新做起,另找同志。一及(直)到六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始开成立大会。”^{[6]9}随后,安庆团组织步入正轨,至1923年秋“本校在此间,尚得此间学生界之欢迎”^{[6]12}。安庆团组织不但积极领导本地的学生运动,还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3年11月17日,安庆地方团组织调查统计了22名团员信息。这些都为安庆建党提供了良好的组织和干部条件。

安庆建党的有力证据主要来自参与建党的濮德治个人回忆。濮德治对当时建党的时间、地点、人员和事件经过进行了回顾,为安徽第一个城市党支部的创建事实提供了有力支撑。据濮德治回忆,1923年冬,柯庆施在万安局1号濮家老屋召开安庆建党会议。根据陈独秀“不要只图量而不求质,宁少毋滥”的指示精神,参加会议的有柯庆施、王步文、濮德治、濮德毅、许继慎、杨溥泉、舒传贤、彭干臣、高永春和姚光耀10人。会上,柯庆施首先宣读了陈独秀的来信,致词并说明党和团的关系,然后宣布成立中共安庆支部,直属中共中央领导。会议推选柯庆施为党的书记,王步文、濮德治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1]6}。

对于濮德治的个人回忆,学术界的最大质疑是:在1923年,除了柯庆施之外,其他参会人的党员身份没有得到证实,仅柯庆施一个党员如何建党?这个质疑的根据在于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对发展新党员和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发展新党员方面,规定“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区委员会之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或“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之党员,当通告该党员所在地之地方委员会,亦须经过候补期”^{[7]270}。在党组织的建立方面,规定“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7]271}。

然而,通过梳理相关史料,可以确定1923年身处安庆的中共党员并非仅有柯庆施一人。1923年6月,柯庆施在写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列出了安庆团支部的15名团员,按照所列顺序,前4人分别是金

家凤、毛一鸣、卢春山、柯庆施。这个顺序是如何排列的?从柯庆施的党员身份和“安庆地方团组织人”的使命来看,能排在柯庆施前面的,要么是党员,要么是团组织内有资历的团员,或者二者兼有之。据有关研究资料,金家凤、毛一鸣夫妇早年跟随陈独秀和李大钊,经过陈独秀推荐考入北京大学,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参加了由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8],也即是说他们都是中共早期党员;不仅如此,金家凤还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8个最初发起人之一^[9]与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北京代表。卢春山于1922年5月入团,是芜湖地方团的创建人之一,正是他两次致信团中央,芜湖地方团才获认可。鉴于卢春山的贡献和影响,他当时是中共党员的可能性较大。除此之外,王步文的入党时间可以确定在1922年^[10]。

综上,至1923年12月,身处安庆的党员至少有金家凤、毛一鸣、卢春山、柯庆施、王步文5人;况且,由于入党时间都较早,这5名党员还可以作为入党介绍人介绍其他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总体来看,1923年12月安庆党支部建立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至于安庆党支部属于什么层级、党员还有哪些人、党员人数是5人还是10人等问题,还需学界继续挖掘有关史料展开深入研究。

(二)安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小甸集特支

相较安徽第一个城市党支部——中共安庆支部的创建,安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小甸集特支的创建较为特殊。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参加小甸集特支创建的人员都是寒假由外地返乡的寿县籍青年党团员,他们多是上海大学的学生,与上海联系较为密切。如,徐梦周、徐梦秋、鲁平阶等人是在上海加入的团组织,曹蕴真于192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薛卓汉和徐梦秋于1923年11月22日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48}。曹蕴真的弟弟曹定一回忆:“在一九二三年冬建立了寿县第一个党支部——小甸集特支,直属党中央领导,曹蕴真任书记。”^①陈允常也回忆说:“开辟寿县党组织的人是薛卓汉”“一九二三年寒假,我从宣城第四师范学校回家,薛卓汉到我家约我到瓦埠方家小楼方运炽家去玩,到方运炽家以后,我们三个人一同到小甸集学校,由曹练白带领我们在一个小庄子上开会,到会的有鲁平阶、

① 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内部资料,1982年版第161页)。

徐梦周、曹蕴真、徐德据以及我们三个人。”^[3]¹⁴ 鲁平阶指出:“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组成的动力,主要是由曹蕴真、鲁平阶、徐梦周三个同志为骨干,向中央提出请示,经批准后成立的。确定成立时间是1923年春天,地点是在小甸集小学。”^①他的回忆与上述几人虽有些许出入,但在中共小甸集特支创建的时间、地点和经过方面大致相同。综合陈允常《寿县党组织发展情况》(1960年6月26日)、曹练白《校对瓦埠地区革命发展情况》(1960年5月20日)和鲁平阶《关于寿县小甸集特支的一些回忆》(1979年4月13—14日、1985年3月25日、1985年4月10日)等材料,可以发现尽管陈允常等人的回忆存在一些相互矛盾的地方,但他们在不同时间、地点对同一个事件的时间、地点和经过的回忆基本一致。由此,可以判断1923年冬中共小甸集特支的创建历史基本属实。

二、安徽“两个并列第一”党支部哪个是真正的第一?

这个问题既是安徽党史学界的研究热点和难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安徽百年奋斗历程中的一个未解之谜。弄清楚这个问题有助于还原安徽党史的本来面貌和廓清安徽党史事实。

在近代安徽革命斗争史上,安庆与芜湖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学生运动和团组织的创建来看,安庆和芜湖是安徽最早开展学生运动的城市,安徽第一个团组织1922年3月在安庆成立,同年12月芜湖团组织得到团中央的正式认可。因此,从建党的组织基础和干部条件来看,首选城市应该是安庆和芜湖。但是,由于安徽军阀的反动统治及其对革命活动的镇压,安庆和芜湖建党较晚。安庆于1923年12月建立党组织,而芜湖直到1926年4月才建立首个党支部。当时活跃在安庆和芜湖的一批早期革命青年很多来自寿县,如曹蕴真、薛卓汉、徐梦秋、徐梦周等,1923年夏他们考入上海大学,在上海加入党组织后于1923年冬又回到家乡寿县小甸集建立党组织。1923年12月或1923年冬都是较为模糊的时间,但可以把具体的时间段列出来。由于不确定“1923年12月”是阳历还是农历,因此这两个时间段又可能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阳历1923年

12月,即1923年12月1日至31日;二是农历1923年12月,即1924年1月6日至2月4日;三是1923年冬,即1923年11月8日至1924年2月4日。由此来看,安徽“两个并列第一”党支部建立时间是在1923年11月8日至1924年2月4日期间。

通过查询当事人活动轨迹考证具体建党时间是比较合理、严谨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参与安庆党支部创建的主要成员中,柯庆施的活动轨迹无疑至关重要。虽然柯庆施回忆说他是1924年春离开安徽赴上海的,但据1924年1月13日的《上海地委兼区委会议记录——改选地委与编组名单》,此时柯庆施被编入上海地委兼区委第三组^[11]⁶⁸。按照上海地委兼区委针对离开上海的党员不编组的惯例来看,此时的柯庆施必然已经身在上海。

考察小甸集特支主要创建者的活动轨迹,薛卓汉和徐梦秋二人最为关键。据公开报道信息,1923年12月安徽军阀马联甲通缉34名学生,从12月初开始安徽大批进步学生纷纷逃亡上海,12月10日《民国日报》和《申报》报道薛卓汉作为上海皖籍学生代表慰问逃亡到上海的安徽学生。也即是说,1923年12月中旬薛卓汉还在上海大学学习。还有一条更有说服力的证据,《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中的校历显示,1924年1月16日至2月23日为上海大学学生放寒假的时间^[12]。因此,1923年12月31日前薛卓汉、徐梦秋返乡的可能性较小。除此之外,薛、徐二人的党员身份也是一个重要线索,他们二人是在1923年11月22日被上海地委兼区委批准为候补党员的,放寒假回乡时还不是正式党员,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规定,候补党员不能作为入党介绍人介绍他人入党,且党员入党必须有两名正式党员作为介绍人。他们二人到1924年2月28日才转为正式党员^[11]⁸⁵。从这几方面来看,中共小甸集特支建立的时间不会早于1924年2月,1924年春的时间表述更为准确。这与鲁平阶记忆的时间(1923年春)虽然相隔一年,但鲁平阶对春天建党的记忆更为深刻,因此可以得出结论:1924年春中共小甸集特支正式创建。

综上,安庆党支部的关键人物柯庆施已于1924年1月13日之前到了上海,而薛卓汉、徐梦秋、徐梦周等小甸集特支的主要创建人一直到1924年1

① 中共六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皖西党史资料辑要》(内部资料,2011年版第7页)。

月16日才放寒假返乡。因此,可以判断安庆党支部的创建时间要早于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

三、安徽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建时间是1922年吗?

在1925年1月党的四大召开之前,党的基层组织并不是党支部,而是“组”^[13]。所以考察安徽第一个党组织不能仅考证安徽第一个党支部的创建时间,还要考证安徽第一个党小组的创建时间。上述论证表明,安庆党支部的创建时间要早于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那么安徽第一个党组织会是成立于1923年12月的安庆支部吗?安徽省内是否存在比安庆支部更早的党小组呢?

1929年5月9日《寿县县委的报告——政治经济及党务工作情况》之党务报告部分指出:“寿县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就有二三同志的组织,当时是党的婴儿时候和以后的机会主义时代,不独没有组织群众的工作,连党都没有丝毫的发展。”^[14]那么,这个文献里面的“二三同志的组织”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是团组织还是党组织呢?

学界对于上述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党小组。2020年田青刚在《大别山精神》一书中指出:“安徽寿县于1922年春建立了中共小甸集小组,次年冬扩建为小甸集特别支部。”^[15]2021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文章《弘扬大别山精神 把老区建设得更好》中也有同样的表述。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团组织或其他进步组织。2023年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的研究成果指出:“寿县在1922年的时候没有‘二三同志’的党员,1923年成立的小甸集特别支部的党员均是1923年加入的党组织。”^{[3]16}并由此认为“二三同志的组织”不可能是党组织,而“极有可能是团组织或者其他青年进步组织”^{[3]16}。

第二个观点值得商榷。1922年寿县“二三同志的组织”不可能是团组织。这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5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及其筹备会议和第一届团中央支委会会议记录》这两个重要文献,都完整记录了从1921年12月至1923年7月这一时间段内全国建立的地方团组织,其中包括1922年3月

建立的安庆地方团组织和1922年12月建立的芜湖地方团组织,但没有关于寿县地方团组织成立的任何信息。

本文认可第一个观点,即寿县“二三同志的组织”是党小组,也是安徽最早的党组织。从《寿县县委的报告——政治经济及党务工作情况》材料本身也不难得出“二三同志的组织”为党组织的结论:从标题来看,报告本身是中共寿县县委的报告;从内容来看,明确了“二三同志的组织”属于党务报告的内容。问题的关键在于“二三同志”是哪些党员?安徽党史学界提出“二三同志”为曹蕴真、徐梦周、鲁平阶3人。但除曹蕴真外,学界缺乏有力证据证明其他两人在1922年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曹蕴真于1922年入党的可能性很大:证据一,其弟曹定一回忆曹蕴真是1922年在上海入党^①;证据二,1924年4月5日的《芜湖地方团员调查表》证明曹蕴真入团时间是1922年^{[4]72}。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安徽历史(1923—1949)》第一卷采用了这一观点:“1922年,曹蕴真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6]但徐梦周和鲁平阶入团时间都相对较晚。据1923年12月《团上海地方团员调查表》记载,徐梦周于1923年12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据1924年6月《团上海地委报告第四号》记载,鲁平阶于1924年5、6月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据此推断,徐梦周、鲁平阶于1922年前入党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2年5月5日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展党员,基本按照先入团再入党的发展程序,柯庆施、蔡晓舟、黄让之、薛卓汉、王逸常、徐梦秋、吴季严等皖籍党员都是如此,作为青年学生的徐梦周和鲁平阶不可能例外。

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二三同志”的党员是存在的。寿县籍早期党员高语罕、毕仲翰、茅延楨、曹蕴真等人都是1922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曹蕴真的活动轨迹主要集中在省内,尤其是在芜湖、寿县,因此“二三同志”包括曹蕴真的可能性最大。下面主要对高语罕、毕仲翰、茅延楨3人的入党时间和1922年回到寿县的活动轨迹进行简要叙述。

高语罕是最关键的人物。当前学界有关高语罕入党时间的研究没有定论。有学者认为高语罕是中共早期党员,入党时间为1920年,依据主要来自张

① 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内部资料,1982年版第161页)。

申府的个人回忆^①。有学者提出新的判断,认为高语罕入党时间是在1921年9月至1922年2月之间^[17]。本文认为,高语罕在1921年底或1922年初上海平民女校创办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可能性较大。综合当前研究成果来看,高语罕最晚在1922年2月之前已经入党。入党以后的高语罕在1922年有没有回到寿县呢?目前还没有直接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涉及这个内容。但根据高语罕的活动轨迹来看,他在赴德国留学前的1921年底至1922年8月这个时间段回家寿县的可能性很大。一方面,当时从上海到寿县的交通已经较为便利,大概只需三至四天的时间;另一方面,即将出国留学的高语罕在临走前回家看望父母亲人也是人之常情。

毕仲翰早年留学日本,“1922年毕业后回国,驻上海筹划旅欧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18]。毕仲翰后因赴欧勤工俭学未成,经人介绍赴芜湖省立五中和二农任教。因此,毕仲翰在1922年入党后回到家乡寿县的可能性较大。

茅延桢于1920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为第九期工科班学员,1923年夏毕业。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在北京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军校毕业后,由党组织安排到上海开展党的革命活动。1923年冬,茅延桢曾返回皖北调查安徽军阀种植罂粟、贩卖毒品的事实,并在上海公开揭露和抨击安徽省督军马联甲祸国殃民的罪恶。目前,从茅延桢的活动轨迹中找不到1922年返回寿县的史料记载,但他在1922年入党后回到故乡寿县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二三同志”的党员是证明“二三同志的组织”存在的前提,由于史料所限,目前还不能拿出他们4人在1922年返回寿县或在寿县建党的直接证明材料,因此还无法详细而具体地考证出“二三同志”的党员到底是哪些人。但相信随着历史档案的进一步解密、研究考证的进一步深入,对1922年“二三同志的组织”的认识和研究定会日益全面和清晰,最终必然拨云见日。

参考文献:

[1] 欧阳淞,曲青山.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1册

[M].济南:济南出版社,2012:5.

- [2]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史:第1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56.
- [3]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安徽早期党组织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3.
- [4]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安徽省档案馆.安徽早期党团组织史料选[M].固始:河南省固始县印刷厂,1987.
- [5]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及其筹备会议和第一届团中央支委会会议记录[J].党的文献,2012(1):3-35.
- [6] 中央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册[M].六安:六安新华印刷厂,1987.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8] 王华.中共党史“边缘”人物不应忽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金家凤研究座谈会侧记[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2):101-104.
- [9]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92.
- [10] 中央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2册[M].六安:六安新华印刷厂,1987:193.
- [11] 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3年7月—1926年3月)[M].上海:上海市印刷四厂,1989.
- [12] 本书编委会.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上卷[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80.
- [13]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1:23.
- [14] 中央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4册[M].六安:六安新华印刷厂,1988:217-218.
- [15] 田青刚.大别山精神[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1.
- [16]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中国共产党安徽历史: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40.
- [17] 代先祥,赵红丽.高语罕入党时间辨析[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8-12.
- [18] 中共寿县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共寿县党史人物[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284.

[责任编辑:吴晓红]

^① 王军著《高语罕传》和《中共党史人物传》中有关高语罕入党时间的依据都来自张申府的回忆录《所忆》。但张申府著《所忆》中谈到高语罕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内容,在编入《“一大”前后(二)》时“高语罕”换成了“高君宇”,因此《所忆》中关于高语罕的入党时间存疑(张申府著《所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1页)。